商业交通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毕　苑

[**摘要**]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关键词**] 晋中　商人　角色特征　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2002）02 - 0076 - 11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Shanxi Merchants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merchant stratum was the characteristic social group of central Shanxi. On one hand they associated with high - ranking offici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lo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 approved by local society. Still, they could not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outside the mainstream moral system leaving them with an awkward dual social role. Simultaneously, central Shanxi merchants had a pronounced gentry first merchant last consciousness, after gaining wealth through commerce they headed toward the path of an official career. Thus, as the merchants advanced toward modern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merchant class faded out as they pursued a more official role. This was the special feature of professional emergence.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谭其骧先生曾把晋商视为封建社会后期山西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与代表特征。对于这样一个极具特色与重要性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早在民国初期就开始了。但由于时局动荡，晋商研究未能走向深入，就连大量的文献资料也遗失不少，因此当建国之后晋商研究真正走向新起点时，远没有较为系统完备的文献参考。即便如此，晋商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在资料收集方面，60 年代初成立了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创刊《山西文史资料》，发表了一些晋商史料文章，并开始由地方高校组织对票号史料的收集编写。1990 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山西票号史料》。一度中断十年的晋商研究在文革之后走向深化，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晋商研究的学者，如张正明、孔祥毅等最早译著和撰写了有关晋商经济活动的著作与文章，并对晋商研究的普及化、推动重视晋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90 年代以来关于晋商研究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多次召开，晋商文化研究新枝勃发，一批有价值的专著相继问世，如张正明、葛贤慧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史若民的《票号兴衰史》，还有诸如刘建生、渠绍淼、庞义才、郝建贵等经济、外贸、金融史专家从各自角度对晋商进

[**收稿日期**] 2001 - 11 - 15
[**作者简介**] 毕苑（1973 - ），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北京 100875

行了介绍和研究。

同时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引人注目。尤其在70、80年代以来，佐伯富、寺田隆信、松浦章、滨下武名、小野合子等人的论文、论著不断问世，其晋商研究可以说自成气候。

通观晋商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成就不小，但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个研究视野显现出“就商言商”的单色调，相比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蓬勃发展与史学界的革命性巨变，晋商研究显得陈旧落伍，还存在着崭新的天地可以开拓。具体到本文的选题，我们圈定了晋中地区商业较为繁盛、商人活动频繁从而更具区域特色的清代与民国时期，作为考察的时段，着重分析商人与地方社会在同一结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以期可以更有力地凸显区域社会特色，以一个完整的盛衰过程展现区域社会的个性。

之所以着重分析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和阶层流动，是出于以下考虑：社会由个体之间的交互活动而产生，社会结构据此可分为三大层次：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而身份、角色、地位等社会化类型和集团等群际化类型正是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类型。[①]文章将要讨论的，正是商人在晋中乡土社会的角色、地位及商人阶层在传统四民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点。

一、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

18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晋中社会处在一个传统性逐渐消解，从而发生社会转型的时期。我想探讨的就是在这个时段中晋中商人的社会角色特征。

因此有必要界定“社会角色”这一概念。这里采用这样的理解：“任何一位学者在谈论角色时都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主观期望和个体的主观表演。实际上，正是这一主客观的统一性，构成了角色的本质内容所在。”“角色，这是地位的动力方面。个体在社会中占有与他人地位相联系的一定地位，当个体根据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他就扮演着相应的角色。”[②]

让我们先从数量上宏观地把握晋中商人群体。先来看晋中地区九个县份的民商户分类统计（1918年）[③]：

县别	民户与商户数			民户与商户比例	
	总户数	民户	商户	民户占百分比	商户占百分比
全省105县合计	2165929	2107289	58640	97.29	2.71
阳曲	48096	44568	3528	92.66	7.34
太原	22340	21456	884	96.04	3.96
榆次	32832	31556	1276	96.11	3.89
太谷	29449	27947	1502	94.90	5.10
祁县	30411	29157	1254	95.88	4.12
徐沟	10384	9643	741	92.86	7.14
清源	15806	15000	806	94.90	5.10
平遥	45512	44133	1380	96.97	3.03
介休	27354	26327	1027	96.25	3.75

从商户百分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晋中地区商户比例远远超过全省的其他地区。这足以说明，在晋中地区，商人是一个值得注意与分析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背后的社会，必然有着不同它处的特色。

固然我们看出了晋中地区商户比例之高，但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主导的社会，我们还应关注一下九县份中农业人口与商业人口从职业角度的对比状况（1921年）[④]：

县别	农业人口	商业人口	农商人口比例
全省105县合计	5396489	959358	5.63
阳曲	63657	29878	2.13
太原	34144	8229	4.15
榆次	79404	26907	2.95
太谷	57588	21501	2.68
祁县	63700	41030	1.55
徐沟	26725	5439	4.91
清源	31555	14100	2.24
平遥	85986	34748	2.47
介休	51443	50590	1.02

表中的数据直白地告诉我们，晋中地区从

事商业的人口占据了多么大的比例。最高者如介休县，农商人口接近相等！这样一个群体在晋中社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无商不言利，商人的功利观是公认较强的。功利不仅表现在对利润的追逐，它包括对所有利益的向往与攫取。封建官本位社会使官僚阶层享受着独特而丰厚的利益资源，早有"中国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皆萃于官"[5]的说法。官僚阶层的强大力量使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仅不能漠视其存在，而且只有将自身很好地融入或与之结合，才能分一杯羹。以商人阶层性格而言，"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官",[6]晋中商人在与官吏的交往中微妙地改变着自身，也由此显现出独特的社会特征。

山西商人与清统治阶层的交往可以直溯清王朝未建之时。据传山西、山东等地商人在东北贸易，早有问鼎之意的努尔哈赤"书七大恨付之，令回国。"[7]商人成为新王朝的宣传前驱。随着晋中商业繁盛，尤其是票号发达时期，商人与官吏的交往就愈频繁。巨商家庭中的商人力图将个人事业系于仕途。如著名的介休冀氏家庭中，冀宝森，"字茂林，号余堂，行二。经商河南赊镇，办团得法，宋帅器重，旋弃商投营，保奖守备衔……"[8]这位守备的职位以后还有上升。不论对家庭、对个人，晋中商人在俗世中最大的追求恐怕就付与这与政权联姻的努力中。从文献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票商结交官吏的几种方法：

其一是资助寒儒应试，为士人科举仕途助一臂之力。这种资助是有选择的，票号对于有希望中举的士人提供种种优惠政策，允许借款赴试；甚至对于外放做官而无资费赴任者也可预为垫支。"盖清国官吏，每逢旨简授一缺，其赴任时，非数千金不能敷衍，故只得仰给于票庄。又在任官吏，公款亏乏之时需款弥补，亦不得不仰给于票庄。而票庄之愿为贷付之者，一则可以图厚利，一则结纳官吏以图日后之存款，而为营业之融通也。"[9]

第二种方法是代办捐纳与印结。首先应该指出捐纳与捐输的区别："国家取资于民，开例授官，详条款，备奏案，谓之捐纳。士人量力输银，藉得列班朝廷，谓之捐输。捐输是奖励，捐纳是卖官。"[10]据考捐纳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就已经存在，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成熟，捐纳制度愈来愈滥，到明末已经是"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11]的滑稽场面了。晚清以来尤其是咸丰之后，内外交困，国势日下，捐纳制度成为挖肉医疮、饮鸩止渴的针石之剂被滥用得无以复加。而"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12]。所谓代办印结，也是一种帮助低职位官吏打通关节，运动升迁的方法。票号办理过的捐纳与印结虽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清代官场中的一种"运动规则"，下面略举数例：

光绪二年四月京号结来 汪嘉诚，由俊秀生在黔局捐监生，加捐府经历，不论双单月分指江西分缺，先免试用，并在京捐局补大四成实银，归新班遇缺补用，并注册验看领凭……统共合本平足银一千七百九十四两九钱七分。

光绪三年十月京号结来 石谷莹，由已捐免验看改指安徽试用未入流，今办吏部注册，并行文知照安徽巡抚按班序补……统共合本平足银一百八十五两五钱。

同治十二年十月京号结来 熊先宾，由监生今在其局加捐未入流是指项典吏，分指江西分缺先免试用，并注册验看领凭；复在京捐局补大四成实银，归新班遇缺补用。统共合本平足银九百另七两五钱一分。

(以上代办捐纳例)[13]

光绪五年二月京号结来 李燧，由已捐分指江西试用典吏，全办注册验看领凭……共银 94.6 两，注册验看费 30 两，统共合本平足银 124.6 两。

光绪五年七月京号结来 盛如松，由已分指江西试用从九品，今单办注册代验看领凭……共足银 92.49 两，统共合本平足银 128.49 两。

(以上代办印结例)[14]

票商、票号还以高度的热情同清政府的高级官吏往来。以往的票商研究也早注意到这个特点，"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长庆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

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另说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结交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15]“清朝官吏，上至皇亲王爷，下至道台知县，都有自己的后台票号。因为清朝官吏不贪污的很少，而对外又要保持所谓‘廉洁奉公’的名声，这样就要寻找为其收藏赃款，而又能为其严守秘密的场所。”[16]交好官吏，票商还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买取官衔和封典。有学者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17]。著名的票号复恒当在开业时领到清政府发给的“龙票”，有了它，就能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18]。日升昌票号在业务鼎盛、“汇通天下”时期，连官吏的升迁、捐官鬻爵、包揽诉讼、地方兴革大事，都能从中操纵[19]。据传说，它的分号经理邱基泰在回平遥总号时，竟乘坐了只有朝廷官员才能乘坐的绿围四抬大轿，使驿站的兵卒以为官差到境，飞报县衙，闹出了一场笑话[20]。应该说，票商在清代官场政治中牟利，实际是把自身绑在了一驾迅速走向灭亡的战车上。这或许暂时能够使票商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毁灭性的结局已由此时开始。

结交高官，固然有利于商人抬高自己的身份，那么具体到晋中社会，商人以何种方式来体现自己在乡土社会中的价值呢？或许这个例子可做为一种典型：“(张) 先生讳联辉，徐沟县人……先世在河南为邑，王氏设商号，推先生经理其事，先生遂游河南，习商业……捻匪乱……先生聚众筹议曰：‘为今之计，惟有兴办团练以捍御地面……’众皆诺，且举先生充团长”。就是这位商务出色的张联辉，率领地方团练在剿捻中屡建战功，并随僧格林沁的正规军出击转战。有趣的是，当清政府评功赏蓝翎，以都司任之时，他却回答忠亲王说：“余练勇原以卫商业也，缴幸能得军名，从此建功行阵，亦非难事。奈号东付托何？奈周家口众商属望何？且前屡却贼，贼恨矣，设乘间袭击，前此办团何为乎？”遂“率众揖辞王，反周家口仍经营商业”。这样一个晋中商人，他的晚年生活状况如何呢？“邑人重先生，有大事，常倚畀。屡任邑令亦钦重先生。如开涂水、金水诸渠，种树、纺织各事及书院、经理诸事，皆取决于先生，事皆得理。”[21]

这样的叙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极为丰富。固然由于“士风日下”，地方精英的位置不再由士人阶层独霸，但以商人从军，最后作为乡居者的张联辉成为乡间魁首、社区精英，有权力处理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诸事，这是极具分析意义的。实际上，这位张先生晚年在乡村中是以一位乡绅形象出现的。除了这种情况，晋中的商人还以多种方式参与社区生活。分析起来，大略有三：

第一，修筑庙宇学堂。仅交城一县就可举出以下几例。如“康熙五十六年商人宋君业兴者会同社首”修建了三义庙的两座殿庑。光绪时交邑重修崔府君庙，“铺户商贾倾囊愿输者若干人，量力酌捐者若干人，一二人倡于前，数十人和于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嘉庆二十五年重修学宫，交邑商人和绅士一起“有输金者、捐力者、鸠工者、庀材者，咸踊跃鼓舞”。道光末年重修大成殿时，“士庶商民劝捐资，共成盛举”。再如平遥超山书院创建时，“城内铺户募捐银七百两有奇”[22]。

第二，修桥筑城兴水利，这方面的例子各县都难以计数。

徐沟县：光绪时重修县城“捐资者则邑中铺商也”[23]。

介休县：康熙修城墙，铺行与绅衿“助修四门楼各角门楼”[24]。

平遥等县：光绪时“惟河工经费较钜”，但是“沿河之平遥、介休等县商富尚多听其量力捐输。”[25]

文水县：光绪时，“李沛，杜村人，慷慨好义，贾于都门。光绪三年旱，南齐村筑堰引汾水灌地，村人亦欲以工代赈，而苦乏资。沛独贷数百金以成其事，至秋获丰收，全活甚众。”[26]

光绪时重修吊桥，“绅衿商贾慨然乐助焉”。[27]

第三，捐输助赈。

如果不想过多地引用资料，我们在这里仅选择一个事件发生时晋中商人的表现为代表，

那就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这场灾荒为山西社会造成的创痕之深、影响之大，是值得专力分析的。对于晋中地区来说，由于务商者多，力农者自然相对较少，面对这场奇荒，乡村社会缺乏平疮机制，故而灾祸尤烈。清政府在灾荒当中无疑是发动救助的主力：“(光绪三年) 十月初二日奉上谕，曾国荃奏：山西全省被灾，本岁秋禾未收，来年春麦未种，停赈无期，急须广筹款项。请令两江总督转饬两淮运司瓜栈及四省督销局道员，在于西岸、鄂岸、湘岸各票商，每大票捐银二百两，皖岸小引每票捐银四十两……”[28]各大票号商人无疑成为捐助的主力。据统计，当时晋中各家票号共捐银 12 万两[29]。在外经商的晋中商人又何尝不挂牵家乡与家人，但情形却往往是：

“囊金裘马走通关，欲顾家乡水复山，只惜人来迟半月，有钱难寄鬼门关。”[30]

在乡的商人自然担负起拯救地方的重任。地方官也希望“各州县积善富绅耆老及盐当邑商、各色富店，并一切上富、中富、小富之家，务期共发慈悲，好行其德，除周恤亲族六姻外，或系附近市邻或属同村共社，凡遇饥民衣不蔽体者，统望各量资力之可能，就近施给棉衣，以恤穷困。”[31]仍以徐沟县为例，“徐邑城坊四镇商贾骈集，其资本多寡不同，而当兹奇荒大劫，不忍坐视……”捐银情况如下 (单位：两)：

粮行 1400 面行 800 钱商 700 东当商 500 花行 180 万盛高 180 万盛顺 140 药料行 100 协丰泰协丰和共 80 颜料行 80 体元堂 50 光远魁 45 谦德恒 40 新盛水 40 日增盛谦和兴各 30 裕泰恒谦光吉积成水共 40 城西面行 20 中和利 15 崇义和 14 广茂堂永和广各 10[32]

中下层小商人则在大灾中尽一己之力：“花书升……用贾起家，晚年乡居好善。光绪三四年大馑，饿殍满路，书升在村独捐芦席……”[33]

晋中商人的慈善举动还包括资助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保婴局、牛痘局、戒烟局、饭厂、粥厂、栖留所及提供归葬费用等等[34]，甚至历久成规：“晋祠于每月二十九日商号施舍贫穷，每人大口二十文钱，小口十文。为此地善举，历年久远，终未一废。”[35]

以上种种方式无非是要说明晋中商人希望获得乡村社会认可，并藉以建立起一种趋于稳定的社会地位的努力。其实，这是商人阶层在俗世生活中的一面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商人对于乡村道德伦理的接纳程度。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合适，因为商人阶层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而是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我的考察是希望分析出晋中商人阶层是否存在自成系统的、独特的甚或有悖于主流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以此来体现其角色特点。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对以下几种商人阶层的品质予以肯定或赞扬：

1、慷慨大方，轻财尚义

“赵鸿瑞，幼随父行商左右……延诸父老曰：‘昔父尝以张公艺范文正之高谊再三讲解，言犹在耳，何忍吝赀财而薄骨肉？’爰计所有慨然分给 (群从昆季)，并诸姑伯姊均之。”[36]

“ (介休张呈锦) 以家事拮据，遂弃占毕、用计然之策走四方，所至辄获奇赢。然慷慨大度，重然诺、轻施予，常俯视侪辈，不屑屑于锱铢之细。嗣后生产日裕，而君漠然视之……”[37]

2、拾金不昧

“吴郁，字文周，以家贫，贾辽东。于义州十八站拾白金一囊，坐而守之，日将晡，一人疾驰而来，下马泣曰：‘我华州李天植，挟赀六百金午前遗失于此。’郁询验封记，不爽，即以与之。李收其金去，郁未尝向人言。”[38]

“王国玺……尝于逆旅得遗金，急追还之。又平阳赵某寄银百两，赵客死，其家人无知者，亲至平阳，访其孙还之。”[39]

“聂喜珠，……乾隆癸丑冬，诣八沟贸易，中途拾一鞍，褥内装宝锭一枚，拟待失者还之。车夫促行且云：‘尔我劳攘何为？何舍此现获者为？’终弗听。顷有仓皇哽咽者至，称三屯营人，与店夥趁墟上沙桥，因骑惊，奔数里始收缰，人虽无恙，而所载失矣。问其形状，数目悉符，竟与之。人皆笑其迂，而彼不顾也。”[40]

3、孝悌守道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是最多的。有表扬对父

母的孝敬的：

“杨文德……父染重病，卧床十二载，文德与其弟文命药必亲尝，衣不解带。父亡后，尝为贾于外，闻母病，日行三百里以归，调护一如父病时。儒学训导给‘孝行尤著’额以示奖。”[41]

“王达吉……幼与古县村王姓为嗣。家贫，及达吉长，经营渐至饶裕。事义父克尽孝敬。”[42]

“黄永升，黑城营人。服贾养母，有所欲必勉从。所得悉以奉母，不敢私。乡党咸称之。”[43]

还有表现对兄弟及子侄的友爱：

“武得元，兄病，以负贩所入奉汤药，既而病益危，医者谓：‘得人指可疗。’即断一指，燃灰进之，兄果寻愈。知县李寿彭旌其门。”[44]

“康贮民……父卒，乃迎继母与弟同爨，服贾致富，为弟娶妇生四子，抚如己出。”[45]

甚至在方志中我们还能看到诸如此类的荒诞剧：

“刘德义……父士敏、母李氏皆有痼疾，奉事维谨……德义经商于外，氏事舅姑尤力。年洎五旬始生一子且慧，人谓夫妇孝感所致。”[46]

在乡土社会中，的确有不少对于从商人家生活的羡慕。祁太秧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此类唱词。如“人伢的丈夫会做买卖，咱的丈夫就会受苦”（《缝袍子》），“买卖人家的妻子们何等舒畅”（《锄田》），“我小子生来有福气，有福住在票庄上，日每吃的猪羊肉，白面都吃得不稀罕”（《上神头》）等等。但是，在民间的理解中，商人对财富的占有并不能使他们成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像祁太秧歌剧《小寡妇上坟》中，那位十八岁就丧夫的商人妻子慨叹的“有钱无势也是枉然”，这种“势”，实际是定位于乡土意识中对“世俗权力”的理解的。还有这样的对话：

“他老子的𠯠可恶。”

“什可恶哩？”

“自幼儿在北京，做的买卖领的东，接官迎富跑衙门，走衙门脱熟红，伢开二指宽的个贴贴，叫三班衙役把你捉拿，捉拿的堂上，进去一问，不管有理没理，就是啪啪啪三十大板、一面枷……俺们可惹不起伢。”

可以肯定，这样的商人才是乡民眼中的“能人”。即使在晋中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商业行为频繁的地区，乡土意识中对封建权势定位的优越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晋中地区这样一个商业风气较浓的区域，经商从开始或许就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对于大多数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阶层来说，如果衣食稍裕，他们必然不会跨上“挟赀走四方”之路。因为乡土社会的神经对于“抑商”这根弦是丝毫未曾放松的。商人群体没有自己的道德意识。地方文献中常有赞扬某位商人的话语如“虽托业商农而每为士大夫所宾礼”[47]、“虽托业商农然谨言慎行有儒者意度”[48]等，那就意味着，要做一个“好”的商人，他必须具有儒家伦理道德熏陶下乡村社会所认同的品格，否则便不能为乡土社会所接受。

二、商人阶层的流动

让我们从传统四民社会开始说起。余英时先生认为，“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他引用《谷梁传》上的话：“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特别让人们注意这里的四民次序，按战国时代的价值观念，商是排在第二位的[49]。而士、农、工、商这个次序的确定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初：“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50]。就是这样一种身份与职业的定位，规定了商人的社会角色，并以巨大的惯性延续了整个传统时代。在这里，我们将试着探讨晋中商人阶层的流动变迁，从中寻找传统四民社会在晋中地区瓦解的脉络。

就晋中地区从商者比例与地位而言，雍正时期就已经是“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51]晚清时仍然是“该省事末者多，富商大贾之家，率皆男不知耕，女不知织。”[52]地方县志中间或有粗略的估计，如“县人操田作者十之六七，服贾者

十之三四”[53]，或曰：“太、汾两府，似乎营商者多，然以农比之，亦居少数。”[54]虽然我们的文献资料向来不具备天然的量化分析价值，但可以大约得出这样的结论：晋中地区是传统社会模式的一分子，特色在于其在草根社会中已经蕴藏了饱满的经商意识。经商在晋中社会远非某种精英行为，而是民众意识和生活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所关心的就应该是在晋中社会从商阶层与一般四民社会中“士”阶层的共生状况。林耀华先生以福建义序为例，分析宗族乡村内操纵乡治的条件有七个：年龄、身份、学识、武艺、世阶、性别和财富[55]。这个标准不妨作为衡量乡村社会角色的共同标准。财富是一条重要标准，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或唯一的。相反，我们在晋中社会可以看到商人阶层面对士阶层从心里流露出的自卑。吴敬梓曾为我们描绘过一个冒姓求名的商人牛浦郎的形象，借用他的话说：“我们经济人家，那里还想甚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56]而在晋中地区具有浓厚商业气氛的社会中，商人阶层对于自己的经商行为却稍有羞涩地遮掩虚饰。本来“土狭人满，田不足耕”是晋中地区现实存在的劣势，也是造成晋中地区商业行为频繁的重要原因。但浓重的本末意识存留在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57]这样的解释，还有“本业不足生，故牵车服贾贸易远方者恒多焉”[58]的无可奈何。晚清票号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占尽了风光的票号，在科考的考官面前也低下三分头去[59]。以这样的生存心态，商人阶层在科举教育中的表现就更加可堪点评。有方志中明白指出“一邑之盛，视乎人文；人文之兴，首重科目。”[60]商人们亦认同这种说法，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他们都对科举功名与教育事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晋商捐输可观，政府对做出经济贡献地区的商人增加科举名额，尤其在咸丰年间，由于国内形势动荡，捐输换取科名的现象就更加突出。《晋政辑要》载：“卷查咸丰七年十一月，户部等部会奏准：山西自咸丰二三四等年，绅士总共捐输银三百四万余两，咸丰五年奏准乙卯科山西乡试加文中额二十名，武中额十三名”[61]，以后的咸丰八年、十一年、同治元年等年份均有加增。具体到各府县，如著名的票号之乡祁县，“咸丰年间，因本邑富户屡次乐输，奉旨于原额外，科岁两试各加进文童十名，岁试并加进武童十名，永为定额。”[62]但就每个业商者个人来看，我们从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的“弃儒就商”现象。首先在中小商人中有这种情况：

> 张钰……长入太学，再试不售，因弃业为商（嘉庆《介休县志》卷十，孝义，八）。
>
> 安卿长，以贫故，弃儒业贾（乾隆《太谷县志》卷七，艺文传，三七）。

晋中平民百姓的人生道路选择正如祁太秧歌《割田》中所唱的：“二老爹娘把你生，送你南学把书攻。念书念了十年整，字未识来书未通。买卖行中不能行，万般出在无其奈，拾掇起来把地种。”

在晋中票号兴盛时期，我们考察著名的票号经理或财东的出身时，更能发现这种现象：

> 乔致庸　祁县乔家鼎盛时代的掌权人，因其兄早丧，家政无人主持，便弃文从商，并很快显露才华。
>
> 渠本翘　祁县渠家最杰出的人物，因耻于钻营而放弃科举仕途，成为山西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
>
> 雷履泰　平遥人，票号的创建者，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弃儒经商。
>
> 侯庆来　介休侯家“侯百万”之子，曾中副榜，后继承家业而经商。（以上材料出自《山西票号综览》）
>
> 刘庆和　平遥协同庆票号经理，志学，迫于家计遂弃儒就商。
>
> 侯定元　介休人，天成亨票号经理，奋然曰“吾能读书，吾何不可就商，忍吾父独任其劳乎”。
>
> 高钰　祁县大德通票号经理，以家道中落，改儒就商。
>
> 王宗禹　祁县人，其先业农，以贫改业商。
>
> 毛鸿秽　平遥人，“蔚”字号经理，幼时家境贫寒，弃学就商，十几岁开始在西裕成颜料庄当学徒。（以上材料出自《山西票号史料》）

李箴视　平遥人，日升昌票号东家，“其祖先以陶朱术起家”。

侯王宾　平遥人，18 岁弃学入蔚泰厚票号。

刘庆和　平遥人，弃学，15 岁入面铺，后入蔚泰厚票号。

张兴邦　平遥人，家贫而就商，入日升昌票号苏州分号。

宋聚奎　平遥人，家贫弃学，入蔚泰厚票号。

李宏龄　平遥人，先世以业商致饶，衍遭寇乱中落。

徐润　平遥人，家贫，弃学经商。(以上材料出自《平遥县志》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毫无疑问，“弃儒就商”就是士人或准士人阶层向商人阶层流动的现象，大致看来，造成这种流动的原因可分为三类：

商家大族子弟 ———主持家政 ————— ↓
普通家庭子弟 ——受社会环境影响 ——经商
贫寒子弟 —————迫于家计 ————— ↑

更为有趣的是，一旦经商致富，从商人阶层的人生走向选择却不是发散多样，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再次指向科举仕途。如太谷一普通家庭中：“（王氏之孙男）立训经商，非王氏志，旋弃商读书，补博士弟子员。”[63]票商大户更是对教育、科举倾注了格外的热情，多数票商都像著名的财东乔映霞那样，办私塾，兴学堂，送子弟赴考、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64]。尤为突出的是著名的榆次常氏家庭。常氏家庭从乾隆时经商，子孙相承，历经七朝近一个半世纪，他们是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商家。就是这样有“世兼儒贾之业”之称的巨商大家，家庭成员中有专营商业者，也有专攻科举仕途者。科举一途有留学日本四人，仕途通达从县教谕至清政府的户部官员及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财政部、农商部官员，山西省临时议会副会长、议员。[65]

这种较为强劲的回流势头是士商流动中最有特色的现象。抑商最初是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实施的，但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我们发现，不仅是“社会”在抑商，“商”也在抑商。是什么原因使晋中社会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地域也存在着难以论说的怪圈？我想这个原因不在制度政策，而在社会本身。有论者说得好：“就社会方面而言，商人与农民的生活方式迥异，其道德标准亦不同，而且商民大多是客户，不像农民一般之土生土长。由于上述的诸种原因，致造成农民不敢相信商人的态度。W. Eberhard ……认为，平民轻视商人而主重农抑商的态度，是因商人不能完成一般平民的道德责任。”[66]晋中社会普通民众也认为：“一个商人，不堪受人尊崇，与圣贤并列。”[67]正如清末民国时期晋中地区一位乡绅在日记中所写的：“近因摊派内国公债，吾邑商人互相控告，纷纷不已，知事无法可施，饬差延请绅士排解……”[68]显然，这种思想融入社会意识，为追求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感，向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攀登，商人阶层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异化代价。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我对有清一代山西的进士进行统计，现将各州县进士数在 6 人以上的排列如下。

清代山西部分州县进士数额表

太原	阳曲	祁县	介休	文水	榆次	清源	徐沟	寿阳	太谷	平遥	汾阳	交城
56	35	13	37	33	32	6	11	18	32	6	39	13
灵石	五台	代州	阳城	沁水	保德	盂县	平定	忻州	太平	襄陵	定襄	崞县
19	16	22	46	21	11	34	64	33	20	11	13	27
沁州	风台	武乡	兴县	黎城	振武	永宁	灵石	蔚州	陵川	繁峙	临县	长治
17	13	13	23	9	8	8	19	6	7	8	10	21
壶关	泽州	大同	朔州	高平	河津	临汾	闻喜	洪洞	稷山	翼城	荣河	芮城
6	21	9	10	23	7	23	27	29	10	41	12	8
永济	安邑	曲沃	蒲州	临晋	猗氏	绛州	解州	垣曲	平陆	赵州	万荣	
10	61	37	15	18	42	13	19	7	17	8	7	

可以看出，晋中地区各县在清代所中进士数的确是很可观的。商风之盛，压制不住整个社会对科举的向往。那么，商人是否就此将自己泯灭于无可奈何的异化之途？情况不会如此简单。一个阶层独立穿行于传统社会日趋瓦解、新型社会结构尚未构建的时代，它为变革中的乡村社会做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注脚。

在整个山西近代社会中，对传统四民秩序产生极大冲击的事件，我认为可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再为佐证。灾荒对山西社会秩序进行巨大的荡涤。饥馑、抢劫、盗窃、窝藏罪犯、买卖人口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民间材料上说：“那时候犯了法也不送县，由保正合公直掌定坤乾”，秩序作为乡村社会的卫道士，已显示出如此混乱与软弱之态，可见，自然灾害对人文社会影响之大。灾害中，一个有趣的材料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份地区官员下发的号召捐赈的文件，文件讲道：

> “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俗赖以维持，但穷年诵读，术既拙于谋生，而洁清自励者又介然严义利之辨，谨廉耻之防。故士类之坎坷往往甚于黎庶……各属办赈官吏督率绅商富户，务以矜恤士类为心……其有单寒之儒，糊口无资，不能自行存活者应与各项贫民一体施赈或酌量加丰。”[69]

不论怎样解释文件的意义，我们不难推断，一个自身存活都需仰仗他人的阶层，如何能担负起“维持人心风俗”之任。不管商人阶层意识到否，光绪大灾已经以有力的一掌推动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商人阶层的流动升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事实上，前面所述晋商的捐输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乡绅刘大鹏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他慨叹道，“嗟呼！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窭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草野。”[70]在这种情况下，晋中百姓“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71]商人阶层更加自傲于人，于是有这样的故事：“吾邑大商某，家资甚厚，为了娶妇，邻里戚族助办婚事者甚多，稍不如其意，辄将相助之人，凌辱备至，而于读书之人更甚，动云皆邑之士，概不知礼仪，受侮者真难为情。”[72]士阶层的沦落使“士农工商”的结构不再牢固，同时也使商人阶层开始注意起本阶层的形象塑造。晋商意识的觉醒在同光时代已露端倪。我们不妨看一看光绪某年山西乡试中一位名叫王炳宸的考生的答卷，他在当年的乡试中获得了第一名。试题是有关西商富而华商困的原因，他认为是“良由商学无专门、商律无专条、商会无专责而中西商情悬绝”造成的，并且呼吁“振裘者必挈领，举纲者必握纲，当以晋商为之倡矣”[73]。文章的见地是深刻的，指出了面临危机的山西商业（时以晋中票号为代表）必须在商业组织与商业教育方面有所改革，否则前途难料。

实际上，地方商会的组建在晚清以来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商学日渐走上正轨。山西的商学据《科场条例》载，早在顺治十一年就已设立[74]，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初等、中等和高等商业学堂的总义及学科规程，1913 年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专设一章对商业学校的规程进行详细说明[75]。在阎锡山“整理村范”时期，时任山西督军的阎锡山寄予商人以厚望：“我深信商人是改革社会的中坚。商人的智识，比人民高；商人的数目，比读书人多，你们要尽力的帮助起来，不数年间，就可把坏社会变成好社会了。”[76]商人阶层在传统四民社会结构趋于崩溃时由这个结构的末位，成为绅士与人民的“枢纽阶层”，这种转化是否将意味着山西社会在潜流中已悄悄发生着革命？

我们很难预测，如果没有近代以来战争频仍造成的恶劣的社会环境，晋中社会的商人阶层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清末以后晋中商业日渐衰败，盛世不再。当年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渐渐淡出，直至抗战前完全消失。然而社会的中小商人阶层是否成为这个历史主角的殉葬品呢？我们来看这样的统计：

(1935年) 山西祁、太、平三县四村镇人民职业种类及分配表[77]

县村别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无业		合计	
		户数	百分率	户数	百分率	户数	百分率	户数	百分率	户数	百分率	户数	百分率
祁县	东左墩村	13	50	2	3.13	20	31.25	5	7.81	5	7.81	64	100
祁县	西左墩村	74	55.22	1	0.75	49	36.57	4	2.98	6	4.48	134	100
太谷县阳邑镇		178	43.20	4	0.98	170	41.26	24	5.82	36	8.74	412	100
平遥县道备村		185	44.58	13	3.13	198	47.71	10	2.41	9	2.17	415	100

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素有“金三角”之称，言其商业之发达，这样一份30年代中期的统计或许更具有代表性。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尽管晋商败落，但中小商人阶层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四个村镇的经商人员都仅次于务农者，甚至平遥县道备村经商者比务农者还多。更有说服力的是下表：

(1935年) 山西祁、太、平三县四村镇近十年来商人失业后改营各种职业之户数百分率[78]

县村别		农业	商业	其它	无业者	合计
祁县	东左墩村	30	40	5	25	100
祁县	西左墩村	40	50	3	7	100
太谷县阳邑镇		20	58	2	20	100
平遥县道备村		50	41	3	6	100

表中数据未必精确，但足以使我们获得大量信息。在商业衰败期，乡村社会仍凝聚着厚重的经商风习，每况愈下的社会形势使破产商人部分转回农村，但失业之后仍有一半的商人重操旧业，可以说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业际流动”。至少这不是走向繁荣兴盛的表征，它只能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滞缓。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那就是从清初到民国中期，“士农工商”结构处于缓慢的消解状态，商人与其说是一个阶层，不如说是一种职业在晋中社会坚守着一片根基。晋中商人与社会的变迁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综上所述，不论是看商户比例还是看农商人口比例，都可以说明商人群体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值得分析的现象。晋中商人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自己在乡土社会中的角色形象。他们结交高官，通过资助寒儒应试或代办捐纳印结，铺设通往主流社会的路途。在地方上，晋中商人修筑庙宇学堂，修桥筑城兴水利，捐输助赈，以多种方式参与社区生活，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乡土社会所认同的道德品格却不是商人阶层塑造出的道德伦理观念，商人阶层仍然不具有独立于主流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晋中商人的社会角色只能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

分析商人阶层在传统四民社会末期的流动现象，可以看出晋中地区的社会特性。虽然在晋中地区蕴藏了饱满的经商意识，但商人阶层的士首商末观念仍然是比较坚固的。从踏上商途的原因来看，大致包括三类：商家大族子弟因主持家政而经商、普通家庭子弟多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从商，还有贫寒子弟迫于家计而经商。在“弃儒从商”而致富之后，商人阶层的人生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再次指向仕途，表现出强烈的回流态势。但随着传统四民社会走向衰落，商人的自醒意识逐渐增强，大量中小商人的存在使商业在晋中社会愈加清晰地体现出“职业”特色，晋中商人阶层在旧的社会结构中逐渐淡出。

---

①张乃和：《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②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③④参见张正明等编：《山西历代人口统计》，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表60、表102。

⑤(54)（清）冯秋航编：《山西乡土志》（影印本），人民风俗。

⑥㉒（清）徐继畲：《退密斋文集》（影印本）卷二，第六十七页；卷三，第六十二页。

⑦《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 5，天命三年闰四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年，第二一三页。

⑧（清）冀麟阁撰：《冀氏家谱》，光绪三十年公安堂刻本，卷三，第二十九页。

⑨⑬⑭⑯(65)《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142、759、765、143、783 页。

⑩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399)，第九四至九五页。

⑫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 年，第 93 页。

⑮(67)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152、24 页。

⑰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 年，第 83 页。

⑱⑲(59)(64)《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第十辑、第十一辑、第六辑。

⑳㉙安介生：《山西票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9、115 页。

㉑常赞春辑：《山西献征》，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本，1936 年，卷七，义行，第十页。

㉓㉛㉜㊸(69)光绪《补修徐沟县志》，卷六，艺文，第六十二页；卷五，恤政，第三十七页；卷五，恤政，第五十二页；卷四，孝悌，第十五页；卷五，恤政，第二十三页。

㉔康熙《介休县志》，卷之二，城池。

㉕㉘㉞(61)(75)《晋政辑要》卷二，礼制风教附，第二十六；卷十八，户制恤政附，第百七十一页；卷十八，户制恤政第一至七页；卷二十二，礼制贡举二，第十四页；卷二十二，礼制贡举二，第十四页。

㉖㉗㉚㊻光绪《文水县志》卷末，志余，第三页；卷十二，艺文，第四十八页；卷末，志余，第十一页；卷末，志余，第三页。

㉝㊱(60)光绪《交城县志》卷八，人物，第七十一页；卷八，人物，第二十页；卷七，选举，第一页。

㉟(68)(70)(71)(72)刘大鹏遗著：《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3、198、145、78、16 页。

㊲《定阳张氏族谱》艺文，第四卷，《兴庵张君墓表》。

㊳㊶乾隆《太谷县志》，卷五，耆善，第二三页；卷五，笃行，第十九页。

㊴㊹嘉庆《介休县志》卷十，孝义，第六页。

㊵光绪《寿阳县志》，卷八，人物上，第五十四页。

㊷㊼㊽(62)光绪《祁县志》卷九，人物，第二十三页；卷九，人物，第十八页；卷九，人物，第二十二页；卷三，学校，续十九页。

㊺乾隆《太原府志》卷三十七，孝义，第二十四页。

㊾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9—20 页。

㊿《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 册，雍正二年五月初九日。江苏古籍出版社，第二十五页。

(5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四年十一月甲子。

(53)乾隆《榆次县志》，卷六，风俗。

(55)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出版，2000 年，第 44 页。

(56)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第 251 页。

(57)(58)张正明、薛慧林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2、27 页。

(63)民国《太谷县志》卷六，列女贤媛，第一百二页。

(66)陈李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中国近现代史论集 19》第十八编，第五七〇页。

(73)（清）杨曹鉴定：《山西乡试闱墨》，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七十八页至七十九页。

(7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 年，第 755、762、771—772 页。

(76)六政考核处校印：《学生旅行团敬告山西父老》，第十八页。

(77)(78)《新农村》第 22 期（1935 年 3 月），第 20 页原表；第 58 页原表。按原表个别数字有误，现已改正之。